

月中，生活於不同國度之南洋華僑或許會面臨相同之窘境，華僑必得以個別不同方式，盡其所能應付當地土著政府。

余 焯

The Chinese Economy, ca. 1870—1911. By Albert Feuerwerke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68. pp. 78. U. S. \$ 1.50.)

The Chinese Economy, 1912—1949. By Albert Feuerwerke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68. pp. 79. U. S. \$ 1.50.)

這兩本在同年內出版的著作，作者費慰愷教授雖然把它們分開來發表，但由於中國近百年來的經濟發展，可說一脈相承，關係甚大，並不因更換朝代而有顯著的改變，故本文把它們放在一起來加以評述。

作者認為近百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和農業的關係最為密切，因此他首先論述農業生產。一般來說，十九世紀的中國農業技術及組織，和十八世紀比較起來並沒有很大分別和進步，到了一九三〇年，這種情形也沒有改變。唯一改變的是人口增加率與耕地面積增加率的不同。一八七三年至一九一三年，每年平均人口增加率為百分之〇·五，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五三年，則為百分之〇·七八，故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國人口已經增加三分之一；可是，耕地面積在中、日戰爭爆發以前，還增加不到百分之十，因此呈現耕地不夠分配的現象。由於耕地面積小、技術落後、災荒頻生，農產每每歉收，農民生產所得只能維持最低的生活程度，到一九三〇年，甚至降到最低生活程度以下。但是，中國經濟以農業為主，農業人口約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七十五。一八八〇年，農業生產佔國民生產毛額 (Gross National Product) 百分之六六·七九，一九三三年則佔百分之六十五。因為農業技術和制度沒有徹底改善，農作物產量既不足以維持日漸增加的人口的需要，更沒有多少剩餘來供給工業的消費，或刺激工商業的發達。我們可以說，直至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國社會還是一個非工業化的社會。

其次，作者認為交通不發達，也是阻碍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為作為主要交通工具的鐵路，到了一九一二年，才築成九、六一八·一公里；一九二八年以後，鐵路才大量修築；到中、日戰爭結束以後，全國共有鐵路二四、九四五公里，其中百分

之四十二築在東北，百分之三十二在長江以北，百分之二十二在華南，百分之四在臺灣。直到一九四九年，大部分地方還是靠古老的方法——人力——來運輸，運費昂貴至等於火車運費的七倍，因此貨物不易流通全國，國內貿易只局限於地方性的市場以內。鐵路建築的里數既然短小，而通車時間又非常之晚，它對於經濟發展自然沒有很大的幫助。

此外，中國的經濟發展，更由於近百年來政治上及財政上制度的不完善而大受打擊。清廷對於國內工商業的發展，採取消極政策，不像西歐國家那樣積極的給予經濟援助和鼓勵。同時，自太平天國革命以後，中央權力漸弱，作為國庫主要來源的田賦多半為地方所把持，關稅又落入外人之手，再加上連年對外戰爭，故自一八九四年後，龐大的軍費和賠款的支出，使政府收支失去平衡。政府每遇重大支出的時候，都要借外債來渡過難關。計一八九四至一九一一年共借外債庫平銀七億四千多萬兩；再加上庚子賠款，自一八九五至一九一一年，對外國債權者共付本息四億七千多萬兩。這樣一來，政府自然沒有力量來資助工業的發展了。民國以後，情形並沒有好轉，作為主要賦稅來源的田稅既被地方扣留，關稅又不能自主，政府唯有靠借債渡日。雖然發行公債，但由於政府信用薄弱，國民購買力微小，實收款額往往低到只有一半，甚至少至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同時，頻繁的內戰使軍費銳增，例如一九二八年至三五年，每年軍費佔總支出百分之四十至四十八，若加上外債（以滿足軍事上的需要為主）和賠款的支出，則佔政府支出的百分之六十七至八十五。因此，政府沒有能力從事經濟建設。另一方面，中國過去的金融制度並不健全，由錢莊、銀號來負責辦理金融方面的業務，但規模很小，故金融長期為設在中國境內的外國銀行（尤其是英國銀行）所控制。到一八九六年戶部銀行設立，中國才開始有現代化的金融機構，但是中國的銀行業務每每只限於匯兌方面，未能運用資金來幫助農村經濟發展及投資於工業，或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達。

由於以上幾個原因，再加上關稅不能自主，及外國商人在中國享有最惠國條款的優待，中國手工業產品不能和輸入的洋貨或外資工廠的產品相競爭，棉紡織工業就是其中最顯著的例子。因此，在對外貿易方面，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一〇年的棉紗輸入量為一八七一年至一八八〇年的二十四倍，一九二〇年以後輸入量還繼續增加，到一九三〇年關稅自主以後才逐漸減少；另一方面，由於規模細小、管理不善、資本微薄、交通困難，以消費品工業為主的華資新式工業，難以和規模大、資本厚、管理完善、以礦工業為主的外資工業相競爭。雖然在一九三〇年，中國手工業產額相對地比一八五〇或一八九五

年為少，但作者指出近代中國工業化，除了日本人在東北的經營能够使那裏工業化程度提高以外，一般來說，成績並不能令人滿意，因為到了一九三三年，礦、工業生產額只佔國內淨生產額 (Net Domestic Product) 百分之一〇·五，其中手工業生產又佔整個工業產額的百分之六七·八，至於華資及外資的現代工業產額，不過佔國內淨生產額的百分之二·二而已。同時，據國際聯盟統計，一九一三年，中國對外貿易額，每人平均低到美金一·六一元，雖然再增加一倍，也是當日八十三個國家中貿易額最小的。因此，即使到了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經濟還未能完全工業化和商業化，近代工業和商業，對於大部分居民來說，還是漠不相關的。

這兩本著作篇幅雖然不多，但簡明而扼要，敘述前後互相發明，使讀者能瞭然於中國近百年來經濟的發展情形和得失原因，要是把它們合起來，可說是一部很好的中國近代經濟簡史。此外，作者對於材料的處理，審慎而精細，尤其對於統計數字，每每引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資料，加以比較和分析，絕不馬虎。例如他在第一本著作，頁四，提出貝克 (J. L. Buck) 對於中國人口的估計，從一八六〇年至一九二〇年，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一·四，如不受干擾的話，即七十年中，人口會增加了一倍；他認為這個比率太高，不很合理，從而根據一九三四年中國官方的統計，加以修改，說從一八七三年至一九一三年，平均每年人口增加率為百分之〇·五弱，即四十年中，人口不過增加百分之十七而已。

可能忙中有錯，二書都有若干排印上的錯誤。例如第一本著作頁三四，表一一，法國在華廠礦資本國幣“4,515,000元”，應改作“4,595,000元”；頁四五，第八行的“*Instituitions*”應改作“*institutions*”；第二本著作頁一〇，第一七行的“*of a a total*”應改作“*of a total*”；頁一二，第三六行的“*andcompetition*”應改作“*and competition*”；頁一六，表五，引嚴中平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頁一二四、一三〇、一三一，應改作頁一二四、一三一；頁五五，第三〇行的“*with a face value of Ch. \$ 1,846,000,*”應改作“*with a face value of Ch. \$ 1,846,000,000*”。

對於中國近代經濟史的研究，蘇聯歷史學家從馬克思、列寧主義方面着眼，由於立場不同，每每不同意美國學者的意見而加以抨擊。（註一）費慰愷教授的著作，他們雖

註一：參考 L. A. Berezni, *A critique of American Bourgeois Historiography on China: Problems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Leningrad University, 1968). An unauthorized digest by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re,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然推許為客觀而翔實，但對於他的未能以馬、列主義解釋中國近代經濟發展，而把工業化失敗的原因歸咎於制度上的不完善，表示不滿意。(註二)自晚清以來，我國工業化失敗的原因，當然有種種的不同，但如果當日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來推行工業化政策，再加上金融制度完備，農業生產技術和組織又不過於落後的話，中國工業化必定另有一番新面目。故作者從制度因素來說明中國工業化成績之所以不好，還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區美嫦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 By Bernhard
Karlgrén. (1954)

(中國聲韻學大綱，高本漢著；張洪年譯。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中國語言文學會出版，1968)

高本漢從一九一五年開始研究中國古代音韻系統，直到一九三四年才完成上古音的擬測。在這差不多二十年裏，他曾經對自己提出的理論作過不斷的補充和修訂。我們當然可以從他發表過的論文中認識他的主張和前後見解不同的所在，但是，把他全部的論文看一遍是相當費時，而且有些書刊也不易獲得。如果要用最少的時間去認識高本漢對中國古代音韻系統的主張，那麼，中國聲韻學大綱是最理想的讀物。在這本書裏，高本漢用最簡單的方法，把他自己認為依然有力的論斷和已經被一般學者所接納的擬測，重新作一次有系統的陳述，至於他已放棄作廢的舊說，則省略不提，這樣當然可以節省了初學者精力和時間。

這本書包括兩大部份：(1)中古音(600 A. D., 隋代)的擬測，(2)上古音(1028—771 B.C., 西周時期)的擬測。中譯本就是根據這個劃分成上下兩冊，上冊是中古音，下冊是上古音。古音的擬測在高本漢以前是沒有人作過詳細的推求，最多也只不過是考定聲母韻母的數目，至於音值的假定，一直到了他的中國音韻學研究 (*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面世後才有一個比較可信的推擬。他利用語音學的知識和科學的方法，根據切韻指掌圖，現代中國各地方言和日本文、高麗文和安南文中的中國古代借字，把中古音的聲母和韻母的讀法擬測出來。至於由中古音到現代漢語中各方言的演變過程，在中國聲韻學大綱沒有作詳細的和有系統的分析說明。如果要了解這個問題，還是要研讀他的中國音韻學研究。上古音是以中古音為基礎，利用詩經和先秦典籍的用韻與及諧聲字

註二：同書，頁二一。